

挟泰山超北海

——美国全球化战略的得失之辨

纵观人类历史，战争绵延不断。中外典籍和野史记载当中不乏压迫与反抗、掠夺与自卫、杀戮与复仇。事后来看，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实际上是绝大多数参与者难以承受的，因此与战争相伴而生的是众生对持久和平的渴望。为了遏制野心和贪欲，人类群体需要共同制定一套严密有效的规则来避免不必要的对抗，以实现和平并管控冲突的后果，这套以规则和规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稳定态势就是“秩序”。

顾名思义，一个社会有“秩序”是说这个社会处于一种有条有理、各个部分之间相互协调、整体运转良好的状态中，并且这个社会的成员对该种状态的持续运行抱有稳定的预期。在各种各样的秩序中，国际秩序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是最为关键的。如果能实现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和相互协作，毫无疑问是全体人类的巨大福祉。然而，要建立这样和谐或合作性的国际秩序殊非易事^①。一种秩序如果能够被建立并且维持下去，需要满足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看起来很简单，真正要实现和满足却困难重重。

^① 关于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和合作性的论述，见周方银：《国际秩序的稳定性与变迁》，《世界政治研究》，2021年第4期。

世界需要秩序

为了说明秩序所必备的基本要素，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公元前8世纪春秋时期邦国政治集团间的互动关系，从中一窥端倪^①。春秋时期邦国政治集团之间的互动明显体现出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政治的特性”，在某些方面与近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模式具有一定的类似性^②。

当时中国正处于周王朝的后半阶段，也就是东周前半叶，周王室的权威已经丧失，各个诸侯国不仅内乱丛生，而且相互争斗不休，社会处于异常的动荡和政治混乱之中，周朝建立的“封建制度”名存实亡。正是为了平息社会乱局，维持封建秩序，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应运而生，并且维持了近两年，历史上称为“春秋霸政”^③。

① 这并不是说古代中国邦国间的政治关系和现代国际关系是完全一样的。我们认为，承认邦国共属于“古代中国”在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关于“古代中国”的概念可参见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顾颉刚：《古史中地域的扩张》，载唐晓峰、黄义军：《历史地理学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孙玉荣：《古代中国国际法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 陈琪、黄宇兴：《国家间干涉理论：春秋时期的实践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③ 关于古代中国邦国间的政治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的异同辨析，可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57-65页；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9期，第6-20页；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陈琪、黄宇兴：《国家间干涉理论：春秋时期的实践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孙玉荣：《古代中国国际法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我们先来大致了解一下“春秋霸政”产生的社会背景。大约公元前11世纪中叶，“武王伐纣”之后第一次分封诸侯，也是规模较小的一次。当时的周族人并没有太大的雄心壮志，分封的诸侯聚集在本族发源地的周围，而对于东方原商王朝的广阔土地则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第一次分封的各诸侯国土地面积狭小，而且距离周王室的直辖地都比较近。为了防止商族人^①作乱，周武王特意把自己的三个兄弟分封在商族人领地的周围加以严密监视，也就是“三监”。然而事与愿违，周武王在灭商仅仅三年之后驾崩而去，由于即位者周成王尚年幼，武王的四弟周公旦辅佐成王处理国事。这一行动引发了大规模的叛乱，原本负责监视纣王之子武庚的周武王那三位兄弟与商族共同发动了叛乱，史称“三监之乱”^②。周公旦亲自率军平定叛乱之后，遂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分封。经过这次叛乱的伤痛，周人体会到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东方广大的地区就无法保证王朝的稳定，于是新一次分封后周人的势力向东大为扩张，甚至超越了原来殷商的势力范围，直达东海之滨，同时在其他三个方向也有了明显拓展。此次分封可以被认为是周王朝大范围地推行“封建制度”，是周人集体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垦殖”运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分封的诸侯从周天子那里获得的不过是一个名义，实际上还得依靠自己宗族的力量与当地原住民不断争斗来开疆拓土，造成的结果就是不少重要的诸侯国与周王室直辖地区不仅相距较远，而且疆土广大，实力雄厚且独立性很强。随着时间流逝，王室和诸侯之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周王室对各诸侯国的控制也越来越松弛，埋下了社会动乱的种子。虽然这些诸侯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权国家，但是相互之间的关系层面已经表现得与当今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间互动模式十分相似了。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因废嫡立庶（废黜王后申后和太子姬宜臼，而立宠妃褒姒为王后，立褒姒所生之子姬伯服为太子），被申后之父申侯勾结外敌犬戎

-
- ① 商族人是中国古老部落，今天我们所说的经商的“商人”一词来源便是商朝。当时商族人重视贸易，善于做生意，而后来的周朝人重视农业，后世“商人”就专指那些从事贸易的人了。
- ② 清华简《皇门》为研究三监之乱与周公治国谋略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史料支撑。新近研究参见刘光胜：《三监之乱与周公治国谋略的展开——以清华简〈皇门〉为中心的考察》，《古代文明》，2020年第3期，第63-70页。

杀死在镐京^①，诸侯共同拥立姬宜臼继位，是为周平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②，西周灭亡而进入东周时代。从此，天子威望扫地而天下乱局频生，主要表现在列国内乱、诸侯兼并和外敌入侵三个方面。

先说列国内乱。鲁国是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国，历来地位尊崇，但在公元前711年鲁隐公被其弟公子轨（后为鲁桓公）杀死。此后臣弑君、子弑父的事层出不穷地在各国纷纷上演。晋国原是周成王幼弟唐叔封地，从公元前705年开始，前后三任晋国国君都被晋国曲沃（今山西闻喜）武公杀死。郑国国君郑武公和郑庄公父子一直是周王室的卿士，地位很高。郑庄公就是《左传》名篇“郑伯克段于鄢”里的“郑伯”，一生雄才大略。但庄公一死，郑国就爆发了内乱。在短短一年之内，郑国大夫祭仲先是驱逐郑昭公迎立郑厉公，旋即又驱逐厉公而迎回昭公，但很快昭公又被另一大夫所杀。在其他诸侯国如陈国、宋国、卫国等，类似事件也接连不断。连后来称霸一时的齐桓公也是因为齐国大夫公孙无知杀死桓公兄长齐襄公而自立，次年又被他人杀死导致国内无主，齐桓公才得到机会继位^③。

再说诸侯兼并。这些诸侯国的内乱背后，往往隐藏着诸侯兼并战争的深刻背景。如果按照《左传》的记载进行统计，春秋时期本应大约有一百七十余个大小不一的诸侯国，而在《史记》中到战国时有记载的诸侯国只有区区十几个了。其中楚国兼并了四十多个诸侯国，晋国兼并了大约二十个诸侯国，齐国、鲁国各自兼并了约十个诸侯国，宋国则兼并了五到六个诸侯国。

最后，诸夏^④混乱更是引起了外敌肆虐。当时的中国并非仅是诸夏在内而四周环绕其他戎狄蛮夷，在地理上实际上处于一种华夷杂处的局面。诸侯国代表农耕文化进行武装垦殖，筑城自守，周围散布着游牧民族。看到诸侯国内部秩序松懈，游牧民族便伺机大肆侵扰。其中狄族最为强盛，不仅灭了滑国，还进攻齐、鲁、郑、晋各国，甚至曾进攻周王室。这种局面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① 镐京，别称宗周，与丰京合称丰镐。考古发现指出，镐京的遗址大约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以北，沣河东岸。周武王灭商后，定都镐京。

② 洛邑，别称成周，中国古地名，在今洛阳市。

③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④ 诸夏，指周代分封的中原各个诸侯国，泛指中原地区。

给中原诸国造成了极大的直接威胁和隐患。难怪孔子不由得对此慨叹道：“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①意思是如果不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了“霸政”秩序，恐怕华夏民族早就灭亡了。狄族固然厉害，但当时中原诸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实际上来自南方的楚国。楚与周的文化和制度明显不同，楚不采用封建而实行郡县制度^②。因此，楚在当时被中原诸国认为是蛮夷之国。在周平王时期，楚武王吞并了汉水附近的姬姓国家，实力大涨。到了楚成王时期，楚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并且对北方一直存有觊觎之心^③。

了解了这些政治矛盾之后我们不难看出，中原诸国当时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因此共同呼唤建立一种秩序以有效化解社会的危局，“霸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首先称霸的是齐桓公，齐国从公元前679年开始先后九次联合其他诸侯国，共同采取措施应对危机，即著名的“尊王攘夷”^④。这种宣称在2500多年之后又被日本的大名借用而高高举起，成为公开反对幕府的政治口号^⑤。从齐桓公与其他诸侯的盟约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理解建立一个“国际秩序”的基本要求。

尊崇周天子是为了给这个秩序加持大义名分，强化各国之间的团结，强调诸夏之间的文化血缘纽带，提高相互之间的认同感，这可被理解为一种道义上的共同约束。在盟约的具体措施当中，秩序的内涵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是禁止各国内部篡弑，一旦发生篡弑行为，其他国家都不能对此予以承认，应在盟主带领下进行平乱另立新君，从而从外部保证各参与国的国内政治稳定及政治正统；第二是裁制各国的兼并行为，要求参与盟约的国家之间要保证互不侵犯，如果发生争端则交由盟主调解，从而维护各成员国之间的和谐共处；第三是禁止各个国家之间限制相互的粮食流通以及阻断水流，即在军事冲突之外不仅禁止发动经济战争，还要尽量在经济上相互帮助。在对外方面，最核心的要求是团

① 《论语·宪问》，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② 战国后期，各国对于新占领的土地已普遍采用郡县制，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更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

③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④ 孔子、公羊寿：《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⑤ 有关“尊王攘夷”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关系，参见瞿亮、刘豫杰：《攘夷思想与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国家意识》，《世界历史》，2019年第4期，第121-135页。

结抵抗外敌。不难看出，“霸政”秩序所提出的几条政治原则针对的正是当时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挑战，可以概括为几个核心目标：利用集体的力量保证各成员国的国内政治稳定；建立沟通协调机制，避免成员之间发生冲突；加强成员互联互通，促进经济活动交流；对外则一致行动，保证集体安全；如果有成员违反上述原则，将受到惩罚。

如果仅此而已，也不过是区区一个“同盟”而并不能称为“秩序”。“同盟”在历史上比比皆是，而“秩序”则凤毛麟角，二者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①。“同盟”往往是针对一个短期目标而实现的暂时性联合，而“秩序”则需要建立在成员国广泛的共识之下，具有一套完整的组织形式和机制设置，并能够长期稳定地再现各行为体的行为模式。齐桓公开创的“霸政”在中原诸国当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而正因为这一认同具有稳定性，秩序才能在之后的近两百年间一直延续着，哪怕主导者已经发生了变化。齐国之后，晋国和楚国相继成为后续的霸主，虽然外部威胁的主要来源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霸政”的基本政治规则仍然保持不变，不仅能在共同目标之下继续把成员国有效地团结起来，甚至还将原本的外部威胁者——楚国也最终纳入这个秩序当中^②。楚国由这一秩序的外部威胁转变成这一秩序的一时主导者，不得不说是该秩序的巨大成功。公元前4世纪，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了晋国，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由于当时已经缺乏有力的主导者，对于这种破坏秩序的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的处理，这三个大夫后来均获得了周天子的认可，成为新的诸侯。于是，“霸政”秩序的基本原则遭到严重破坏，没有力量可以修复，秩序随即解体，社会也进入了更加动荡的战国时代。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秩序”就此瓦解。

“春秋霸政”的兴亡给予我们相当深刻的启示。一种秩序的建立往往需要强大的主导者，主导者需要提出一套具有感召力的理念并能形成广泛共识，吸纳其他国家一同参与秩序的建立，并且主导者要能保障秩序的各项原则得以顺利

① 有关国际政治中的同盟，参见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欧洲》，1999年第5期，第14-25页。本书的“秩序”专指国际秩序，参见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32页。当然，一些新近研究注意到了“同盟”与“秩序”的关系，见刘丰：《联盟与国际秩序》，《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3期，第3-19页。

② 晁福林：《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

推行，成员一旦违反秩序规则，主导者要进行适当的处理以维护秩序原则的权威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秩序遭受到了外部的威胁，主导者需要带领成员一起共同应对。毫无疑问，主导者会从此秩序当中获得最丰厚的利益，但是同时也必然承担最广泛的义务和代价，正所谓“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利益与义务不相匹配，成员则离心离德，秩序必然解体。

仍然以“春秋霸政”为例。齐桓公当初为了树立威望以推动霸政，做了很大的努力，也牺牲了不少齐国短期的利益，承担了更多的义务。为了联合其他国家，齐国不仅主动归还了之前占领的鲁国、卫国和燕国的国土，还积极担负起援助盟国的责任。公元前663年，齐桓公亲自率军援救燕国抵抗山戎；公元前661年，出兵援助邢国抗拒狄族；公元前658年，齐国援救卫国，并且帮助卫国建筑城堡^①。中原各国在齐国的带领下，合力抵抗住了来自楚国的威胁，维护了封建制度的存在。

维持一个秩序的努力不仅表现在军事上共同御敌，经济上也要互相帮助。春秋时期天灾频仍，齐国作为盟主主动对成员国施以援助。《国语》中记载，公元前666年鲁国发生饥荒，鲁庄公派人带着国宝玉器作为礼物向齐国求助^②。齐桓公听说了鲁国的困境，不仅立即进行援助而且拒绝了鲁国的礼物。类似情形还发生过多。在齐国的示范作用之下，各个成员国之间也多次自主展开相互援助。公元前647年晋国与秦国关系恶化，而当时晋国遭遇饥荒只好向秦国求助。秦穆公不但拒绝了大夫丕豹提出的趁机进攻晋国的建议，而且答应借粮。秦国派船运载大量粮食由当时的秦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先沿渭水运输，然后改为车运，横渡黄河之后再沿山西汾河漕运北上，直达晋国都城绛城（今山西襄汾）。百千粮船白帆高悬，络绎不绝，从秦都到晋都八百里几乎是首尾相连，史称“泛舟之役”^③。这是何等壮观的场景，又体现出怎样的一种义利信仰。对照历史审视今朝，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肆虐之下，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不仅不联合世界各国共同抗击病毒，反而置国内民众生死安危于不顾，并且四处煽动仇恨，忙于甩锅、推卸责任。同样，欧盟各国家之间不仅没能践行欧洲一体化的理念

① 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② 左丘明：《国语·鲁语》，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③ 左丘明：《左传·僖公十三年》，杜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而守望相助，反而截留医疗物资，实施各类限制措施，自行其是而各自为政。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开启，欧洲再一次陷入了战火的蹂躏和痛苦之中。抚今追昔，怎能不令人喟叹。

在维护秩序原则的权威方面，齐国作为盟主也当仁不让，并在执行规则上颇为一丝不苟。公元前659年，齐桓公的妹妹哀姜与鲁国公子庆父合谋杀死鲁闵公，企图拥立庆父为君，破坏了禁止篡弑的约定，桓公为此召回妹妹哀姜并毅然将其处死^①。试想一下，秩序的主导者如果不能以身作则，随意践踏原则，而又一味地要求其他成员遵守规则，这必然损害主导者的威信，导致秩序的崩溃。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齐桓公才在诸侯中积累了足够的威望，终于在公元前651年于葵丘（今河南民权）大会诸侯，并获得了周襄王的认可，成为名正言顺的“霸主”，秩序才真正建立^②。由此可见，建立一个“国际秩序”有多么艰难！

人类社会绵延数千年，至今从未出现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统一秩序。以往或许是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高山大海相互阻隔，人货交通往来不便。而在21世纪的今天，全球秩序难以形成的原因则更大程度上是来自思想和观念上的分歧。如同之前所说，全球秩序的建立首先需要塑造一个能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认可的共同目标，并能切实地付诸实施。即使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目标，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道路选择上，各个国家之间往往存在着极其深刻甚至是难以调和的分歧。天下如此之大，民族林立而思想多元，各种矛盾纵横交错，想要在此条件下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秩序，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在30年前，遥远的天际似乎曾经出现过一丝希望。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经过了与苏联近半个世纪的对峙之后最终获胜。美国挟着无与伦比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身后还有众多的盟友追随，一面自称占据了道德高地，不遗余力推广“自由、民主、繁荣、进步”，一面挥舞着硬实力的狼牙棒尽情地扫除残余“障碍”。美国信心十足地准备真真切切地打造一个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性国际秩序，当时有很多国家对此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认为人类社会的新纪元也许近在眼前，其中不乏诸多身陷困境的第三世界国家。时过境迁，站在今天

① 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② 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齐桓公“葵丘会盟”盟辞的“五禁”条款，参见《孟子·告子下》，百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回望来路，美国企图打造的全球秩序现在不但步履蹒跚，而且实际上已是难以为继了。作为主导者的美国似乎打算抽身而走，受困于一种全球雄心与孤立主义相混杂的矛盾状态，而缺少了协同一致和团结协作，世界无法继续有效应对共同面临的具有严重挑战的治理议题。新的秩序不仅没能够顺利建成，人类社会整体上反而滑向充满更多困惑和无奈的晦暗前景。